
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

——小说《红岩》史实研究^{*1}

张均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红岩》无疑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制作,但其文本生产包含不太为人注意的张力。这体现为双重“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在狱外斗争本事改写中,大幅删除阶级以外犬牙交错的复杂社会关系,却又同时大幅“升级”地下斗争“神魔斗法”的惊险系数。在狱内斗争本事改写中,同样将江湖关系、逆转的阶级关系删除殆尽但又于“斗智”、“斗勇”上竭尽能事。这种周旋于革命与江湖之间的调适技术,既确认了英雄的“力学的崇高”,又满足了“一体化”时代读者之于刺激、风险和不可预测性的“脱序”想象,颇尽叙事之妙。

【关键词】：《红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江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7)02-0166-07

如果单论牺牲的惨烈程度与规模,发生在1949年11月27日的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屠杀案(死难烈士200余人),只能相当于解放战争中无数恶战、血战中的一次小规模战斗。甚至,恶名远播的白公馆、渣滓洞实乃歌乐山深处两处林木幽深的所在(白公馆本是青翠满目的别墅)。它们何以会成为著名的事件与“风景”呢?显然与长篇小说《红岩》(杨益言、罗广斌、刘德彬,1961)有关。然而这又让人疑窦丛生:一部定位在“共产主义教科书”的小说,再加上略嫌乏味、其实不甚相干的书名^[1],它又怎么能够吸引无数读者以致销量高达800万册之巨呢?这意味着,这部以共产党员英勇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一定别有作者不曾明言的叙事秘密。如果说文本“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源于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受到多种不同层面社会结构力量的制约”^[2],那么《红岩》所循就绝非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此,笔者细勘当年重庆地下党的地下工作史实与小说故事之差异,发现《红岩》在使用“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方面,确实有不凡经验。

“革命”在此当然是指重庆地下党与国民党军警之间的斗争。“江湖”指义则较复杂。据王学泰研究,中国文化中的“江湖”主要有两层所指,一指“士大夫的以在野的身份隐居的地方”及价值空间,它“是安谧的,悠闲的,超脱了是非功利,是纯洁灵魂的场所”,二指“游民的生活空间”及价值空间,这“是官府和法律难以管到的地方。它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明争暗斗,极具危险性和不

¹ 收稿日期:2016-1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本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49-1976)”(14BZW128);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本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49-1976)”。

作者简介:张均,男,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安定感”，此一“江湖”要“走”、要“闯”、要“争”，“也要遵循一定的江湖规范”^[3]。显然，《红岩》涉及的“江湖”与后者有关。险恶难测的生活环境，诡异复杂的社会关系，侠义传奇的人生际遇，这类脱序的“江湖世界”既与大众生活紧相粘连，又游离其外而激发着大众想象、窥看、体验的强烈欲望。应该说，作为“共产主义教科书”的《红岩》，倘无“江湖世界”的强劲支撑，断难引发千万读者的阅读热情，更谈不上在“革命”已被“告别”的今天还能被继续改编为电视剧。那么，革命与江湖的关系在《红岩》中是怎样存在的呢？如果把其中革命斗争区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狱外斗争、狱中斗争）的话，那么在二者中“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都充当了从本事向故事转换的叙事“密码”。

一、狱外斗争本事改写中的革命与江湖

就狱外斗争史实来看，革命与江湖之间原本即纠葛难辨，边界模糊。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诸种江湖关系犬牙相错，构成了革命的“周边”故事。较之中国其他地区，重庆尤称“鱼龙混杂”之地。政党、军阀、土匪、袍哥，使国共两党的“地上”、“地下”之斗争，搅动、牵涉到江湖化了的各种社会力量与利益关系。如袍哥（哥老会）组织在四川影响极大，据范绍增估计，其人数约在四川成年男子中的百分之九十左右^[4]。民国时期，从省主席、参议员、县长到乡镇保甲长等地方权力人物，几乎都有袍哥身分。在此情形下，中共地下党要发展党员、推动革命，势必要循依辛亥革命的旧例，与袍哥组织发生利用或合作关系。一桩不易为人注意的细节即可表明地下党与袍哥的事实关系。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罗世文被捕以后，军统负责人周养浩设宴相请（小说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情节由此而来），席间即邀请了地方袍哥做中。马识途也回忆，当时地下党组织曾有利用民间秘密组织的明确考虑：“方方讲了改善生活、二五减租等各种各样形式的斗争，以及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如姊妹会、兄弟会、哥老会一类的东西，通通都钻进去，并在这些组织中搞武装训练，这样才能够坚持。”^[5]此外，军阀与地方势力也构成了“重庆地下党破坏案”的背景。小说中刘思扬的两位原型罗广斌、刘国鋋皆出身地方望族。刘家为泸县首富，其兄刘国琪为银行大亨，罗广斌的父母皆系高级知识分子，兄罗广文更是国民党军第16兵团司令。强势的家族背景不仅增加了罗、刘的斗争勇气，亦使特务对他们“礼让三分”（两人在狱中皆不曾受刑）。至于私人义气、保密局内的“山头之争”，同样是这一事件中虽隐实存的“线索”。材料显示，渣滓洞、白公馆在押人员其实不全是地下党和民主人士，亦有军统内部的“违纪人员”^{[6][21]}。其中又往往“夹杂”有因内部派争而被挟私报复者，个别特务甚至被有意混在地下党中胡乱枪毙。应该说，1948-1949年间的重庆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混乱“江湖”，而革命则是其中“众声喧哗”但“主线”相对清晰的一桩历史事件。（2）革命的江湖风险。细读史料，可以发现当年地下革命者与其说是在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不如说是身陷在一个杀机四伏的“江湖”：这里充满潜伏、绑架和刺杀，一步错步步错，千钧一发、命悬一线。譬如，地下党员、文诚书店店员陈柏林发现店内常有一位脸色苍白且有正义感的失业青年（实系“红旗特务”伪装）前来看书，大加同情并欲发展为地下党员，结果导致自己和上级任达哉、许建业相继被捕（任叛变，陈、许被杀）。许建业被捕后还再度“掉进”看守特务设好的圈套：“他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放着17位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看守陈远德发现许建业焦急不安，便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许建业被陈远德的假象迷惑，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系中共党员）的信，要陈远德赶快送去。这封信马上被送到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徐远举立即抓捕了刘德惠，还根据从许建业宿舍内搜到的入党申请书，先后抓走了17人，其中6人后来被枪杀。”^[7]而同处暴露情形下，李维嘉、陈然判断力的不同直接变成了生死之隔。据材料载：

李维嘉从北碚回到重庆，发现家中有特务进驻，当即返身离去。他返回上清寺，经两路口，菜园坝，转往龙门打锣巷，找他的交通员林友梅探听究竟。林说：拂晓时分，冉益智突然到他住的大通商号，问“老李来过没有？”他答道：“没来过”，再即忙下楼而去。……（李）判断一定是市委书记、副书记出了问题。因为他住的地方只有刘国定、冉益智、林友梅知道。李猜测敌人在抓他的同时，也会对其他同志下手。他怀着一线希望给《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寄了一封信，大意是：“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暗示他赶快离开。陈接信后迟疑不决，遂在22日被特务逮捕。^[8]

与此类似，马识途被特务当街夹围而能巧妙脱身，罗广斌在自家豪宅却被轻松诱捕。可以说，真实地下斗争的惊险、紧张、不可预测性其实还高于小说《红岩》，原本即有强烈的江湖气息。这使《红岩》的阅读刺激度大大高于土改、合作化等平实、严肃的作品，“（它）

不是大家习闻常见的,而是秘密革命,非公开的地下斗争,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和监狱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地下斗争,华蓥山的游击队活动等等,都是在暗地里秘密进行的”,“对秘密事件的暴露,极大地满足了普通读者的‘窥视欲’和好奇心。”^[9]

应该说,即便直接将这些狱外斗争“江湖记”实录进小说,也不会缺少读者,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当年持续热销即是明证。《红岩》出版后的巨大轰动亦根基于此。不过,《红岩》真的只是实录真实的狱外斗争就能获得那传奇般的传播效应吗?显然不是。客观而言,《红岩》的确大幅接纳了革命中的“江湖”事件,但此种接纳若理解为“整编”毋宁更为恰当。这可从三个层面予以观察。

其一,大幅“涤除”了狱外斗争中除阶级以外的其他犬牙相错的社会关系。譬如,在重庆成年男子八九成以上皆有袍哥身份的情形下,《红岩》中地下党却从未利用袍哥渠道展开斗争,更无一人兼有袍哥身份。又如,与罗广斌、刘国鋳等富家子弟有关的地方势力一度介入保密局办案,对徐远举构成了不小压力。据国民党成都稽查处处长周迅予交代,其实在抓捕罗广斌之前,徐远举已与16兵团司令罗广文取得联系,是“罗广文叫我们逮捕罗广斌的”^[10]。而罗广文之所以同意同意特务抓捕自己弟弟,不过是怕不知情的小特务误杀了罗广斌。事实上,徐远举也向罗广文保证了不伤其弟性命:“一旦令弟稍有悔悟,即当优先予以自新机会。”^[11]此后,尽管罗广斌拒绝保释出狱,但徐远举仍在“一一·二七”大屠杀前夕“下令释放罗广斌和其他几位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共产党人。”^[11]不过因为局面失控、徐远举自己也仓惶逃跑,该命令并未被传达到位。对此种种复杂的“江湖记”,小说悉未提及。由此,势力、帮会等复杂社会关系就在叙事中隐失,而阶级遂在排斥“江湖世界”的基础上成为小说叙述中绝对的“主导概念”。

其二,大幅“升级”地下斗争的惊险系数。客观而言,现实斗争已很“精彩”,但《红岩》仍努力将之处理成了当时方兴未艾的苏联式“惊险故事”。何云贵认为,“(小说)运用‘发现’与‘突转’造成故事趣味”,“尤其善于运用‘秘密’进行故事讲述”,“特务探密,叛徒告密,革命者保密;敌人制造陷阱,革命者识破陷阱;敌人埋设特务,革命者反特清特等等,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二元对立叙事模式”,“围绕秘密展开的一个个斗争就构成了阅读过程中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兴奋点”^[9]。这是准确判断。其实,在小说中仅卧底斗争就出现了三次,一是“红旗特务”郑克昌冒充失业青年打入沙坪书店,二是郑克昌再次冒充被捕党员“高邦晋”企图打入狱中党组织,三是特务“老朱”冒充党的联络员与假释中的刘思扬联系,企图骗取狱外党组织情报。第一次卧底有本事依据,第二次、第三次则皆为虚构,但这种“改编”方法无疑可以一次次地引起读者的猜疑、紧张与兴奋。小说中千钧一发的场景亦颇常见,如甫志高在家门口突然被“一只冰冷的枪管”抵住背脊“害怕得连心跳也停顿了”(《红岩》,第133页)^②,实则现实中并无此事。

在以上两种本事改写中,实际上都暗藏着“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尤其第一种“涤除”阶级之外复杂难辨的社会关系,其实是在用“革命”遏制“江湖”。但第二种改动恰好颠倒过来,明显是藉“江湖”因素增加“革命”的叙事魅力。恰如凯尔纳所言:“如果意识形态仅仅只是谎言和神秘化,那么它就抓不住个人的生活体验,如果它没有迷人的特点,它也无法吸引人”^[12],显然,惊险系数提升旨在制造小说“迷人的特点”。放宽视界看,《红岩》与当时《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等革命通俗文学一样,成功取资了古代传奇所谓“爱奇者闻诡而惊听”(《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的美学传统。《红岩》讲述的“地下工作”本身就带有“诡而惊听”、激动人心的特征,如写成岗在储藏室里秘密印刷《挺进报》:“他望了望寝室后面那扇熟悉的储藏室的小门,站起身来,走到门边,开了锁,扭着把手,推开小门,扭亮储藏室里的电灯。又转身出来灭了床边的台灯,然后再走进储藏室,关上小门,从里边锁上暗锁。他面前摆着一部自己改装的油印机,粉红色的打字纸整齐地堆在桌上”,“他熟练地穿好围腰,戴上手套——这样,油墨就不会弄脏手和衣服,即使有人找他,他也可以从储藏室里出来,不会带着叫人疑心的痕迹。成岗打开了油印机,铺上蜡纸,滚筒沾上调匀了的油墨,轻快地印出了第一页。”(《红岩》,第51页)更重要的是,这种“诡而惊听”还是通过“斗”的传统故事技法来体现的。对此技法,陈思和总结为“道魔斗法”,认为此种隐形结构普遍存在于民间通俗作品中:“一道一魔(象征了正邪两种力量)对峙着比本领,各自祭起法宝,一物降一物,最终让人满足的是这变化多端的斗法过程,至于斗法的结果却无关紧要。”^[13]其实《红岩》关于狱外斗争的本事改写也取资于这种“道魔斗法”技法。《挺进报》的发行与查收、书店里的卧底与反卧底、地下党的神出鬼没与特务的满城搜捕,

² ①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以下皆同)。

可谓斗智斗勇。如此“道魔斗法”，兼之接头、眼线、暗号、纸条、搜查等秘密工作，无疑使《红岩》另有“迷人的特点”，甚至使沉重血腥的地下斗争变得有几分热闹、几分传奇。在此，“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初步显示了它在本事转换中的平衡机制：“革命”确保了故事的阶级原则，“江湖”则从技术层面上将“革命”嵌进大众之于秘密、惊险的期待。

二、狱内斗争本事改写中的革命与江湖

不过，这种以“惊听之事”^[14]、热闹传奇为旨的美学趣味不宜随便使用，它可能导致“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内在平衡的丧失。早于《红岩》出版的《林海雪原》（1957年）虽然风行无两，但它的过于“热闹”的传奇特征也引发批评。如冯仲云认为，《林海雪原》把残酷的东北剿匪写成仅“凭着少剑波的机智、多谋和杨子荣的英勇、果敢就能解决的”浪漫故事，是“脱离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在军事上也是传奇性，武侠式，不真实的”^[15]。如上所述，《红岩》其实亦有“脱离现实”的传奇趣味，但整体上这部小说仍给人严肃甚至神圣之感。何以如此呢，主要因为作者在小说的主体部分——狱中斗争——中更精确地使用了“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与狱外斗争一样，即便在监狱内、在岗哨与囚室之间，现实的江湖“规矩”仍强势存在，但在从本事到故事的转换中，其“江湖”本事多半被删除，然而“道魔斗法”的隐形结构依然存在。这可从两个大的方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方面，狱中斗争的“江湖”因素几乎被尽数“删除”。一般读者阅读《红岩》，会对狱中斗争的正邪分明、势不两立留下深刻印象，会以为狱中只有酷刑、流血和崇高而全无其他，其实并不尽然。据笔者考订，当时渣滓洞、白公馆狱中，国共冲突当然是“主线”，但同时亦有另外三重或有江湖色彩的社会因素亦影响着狱中难友及特务的行为及思想，但它们在小说撰写时多沦为“不可叙述之事”。

（1）非政治的社会关系。狱中难友与特务之间自属势不两立的敌我，但长期关押、无事相处之状态，亦使其他社会关系甚至某些地缘认同、文化认同渐次凸显出来。如江竹筠就主动关心荣县同乡、看守黄茂才。因此同乡之谊，黄茂才后来成为狱中难友的“秘密送信人”（徐远举被捕以后不承认他治下的监狱会发生此类事情）。江竹筠给丈夫前妻弟谭竹安的托孤信、党员胡其芬的《最后的报告》皆由黄茂才冒险带出并交付。又如同为20多岁青年人，熟悉之后看守与难友时而一起下棋，一起打篮球。渣滓洞外驻扎的警卫连也对政治犯多抱同情之心，以致狱中党组织考虑予以策反（但该连在大屠杀前夕突然换防调走）。又如同为读书人，出身书香门第的看守长李磊（小说中取名“大猩猩”）答应难友要求，在狱中开设了小型图书室。罗广斌以此得以在狱中“比较仔细地修了理化、生物、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原理等自然科学，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社会史教程、中国古代及近世思想学说史等。”^{[6]430}新四军被俘战士龙光章病故后，李磊也以挽联“人生百岁难免一死，愿君超凡直上西天”相赠（此事《在烈火中永生》有载，《红岩》则删除）。当然，同乡、青年、读书人等认同关系的事实存在，并不否定而只是缓解了敌我本质上的对立，但小说中剑拔弩张的恐怖形势，显然不完全是事实，而多少是“把无关于叙事目的的一些事实排除出去”^[16]的结果。

（2）逆转的阶级关系。地下党与保密局的斗争是国共冲突亦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冲突的表现，但在现实的渣滓洞、白公馆中，代表无产阶级理想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如学生党员），代表资产阶级者却多有无产阶级（如“吃粮”的普通士兵）。即是说，在“规范”的阶级冲突之下暗藏着逆转的阶级关系。这貌似吊诡，实则极易理解，因为“穷人为获得工作、土地和收入而奋斗，他们的目标并未指向诸如社会主义等大的历史的抽象概念”^[17]。为衣食故，农民或城市下层往往倒乐于受雇于政府军队，而真正愿为下层解放奔波于途者，却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家庭的青年。所以，被捕地下党多是出身较好的知识分子，少数甚至出身大富之家，譬如罗广斌、刘国钰、王朴等。其中王朴烈士系小说中“监狱之花”的父亲（但《红岩》未提孩子父亲为何人），不但自己投身革命，还毁家纾难，他和母亲资助地下党武装经费竟达2000余两黄金之巨。其他难友虽非此般巨富，但也多具有体面职业并有广泛的上层关系。相反，代表“资产阶级”的一般特务和看守，往往只是当兵“吃粮”的穷苦青年。这种逆转的阶级关系使狱内情形并不简单呈现为迫害/被迫害关系。比如，罗广斌“在渣滓洞狱中利用自己的‘身份’大干‘违反监规’的事，鼓励难友同特务们做斗争、写纸条、传递外界消息，还经常带头闹事”，“猫头鹰”徐贵林“终于恼了，向看守们下令：‘你们好生盯着他，要再给老子狗屁胡闹不守规矩，老子还就要惹他一下，

整他一下又会咋的?!”^{[18]39}可见,一般特务并不敢“惹”在押犯罗广斌。据载,一次罗广斌传纸条被特务俞德新发现,俞打算上报给徐贵林:

“唉,你怎么这样没脑筋呐?!”黄茂才叹一口气,假意为俞德新着想,“你想想看,如果因为你的报告使罗广斌吃了看守长的亏,他罗广斌还不恨死你?!今后他被他哥哥弄出去,告你一状还不定丢小命呢!我说老弟啊,咱吃这碗也就求个一天三顿饱,求个后路安稳吧!”俞德新见黄茂才说得有道理,也是为他好,发了一会怔,点点头,“也是这个道理,那就放他一码算了!”^{[18]39-40}

特务们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此,身处囹圄的政治犯面对特务时未必完全处于劣势。据现有史料看,难友们常用金钱或人脉资源收买看守。如资深特务唐友元“因为没有文化,一直只是少尉军衔。老婆是家庭妇女,儿女一大堆”,“家庭生活没有保障”,“何柏梁烈士的妻子曾咏曦(共产党员)掌握这些情况后,在狱外做唐友元老婆的工作,何柏梁在狱中做唐友元的工作,答应给他女儿介绍一个好工作,从而取得了他的信任,愿意为何柏梁送信、带报纸、药品等,每送一次东西,何柏梁都给他优厚的报酬。”^{[6]148}显然,这种逆转的阶级关系使现实狱中斗争多了许多驳杂之处。对此类本事材料,《红岩》毫不犹豫尽数“删除”。

(3)“识时务者”的投机主义。“重庆地下党破坏案”发生在1948-1949,其时国民党大势将去,“三大战役”后“特务们处在一片惊惶之中,各自打算着自己的退路。”^{[18]41}“退路”之一就是不过分得罪有可能释放为官的在押政治犯。故在表面残酷之下,狱中情形其实比较复杂。若非蒋介石个人泄愤(蒋直接下令枪杀重庆政治犯),这些地下党人很可能在解放军攻城之际直接出狱并现场接受看守、警卫的武装起义。另一“退路”是直接利用在押政治犯,罗广斌等19人在白公馆的幸存即与此有关。档案记载,看守杨钦典、李育生在解放军攻城的混乱中逃跑,“(杨)把白公馆里还关有19个犯人的情况说了出来。李育生一听,不禁灵机一动,把杨钦典一把拉到路边商量:‘你龟儿子好憨,手头有救命的宝贝,你还跟着国民党跑啥子?不如我两个回到白公馆,把那19个人放了,共产党来了,还能不给我们一些好处?’杨钦典有些迟疑,说:‘我出来时看见外面警卫连还没有撤,弄不好会把命出脱了。’李育生说:‘国民党垮定了,你已经拿了资遣费,还跟着跑到成都去干啥子?如今兵荒马乱的,胆大能漂洋过海,胆小就寸步难行。走,说干就干,哥我陪你回白公馆’”,两人“于是掉头回白公馆。”^[19]应该说,李育生“江湖”式的赌博与投机,导致了罗广斌等的幸存。罗广斌日后在回忆中多将此事归功于他本人对杨钦典的革命启发,到撰写《红岩》时则矢口不提此事,而另外虚构了夺枪、枪战、借助地下暗道成功脱逃的匪夷所思的情节。

以上非政治性的社会关系、逆转的阶级关系和“识时务者”的投机主义,共同构成了监狱内部的“江湖”性。应该说,“江湖”的存在使革命的“你死我活”变得缓和,甚至可能使敌人/朋友关系发生颠倒。遗憾的是,这三层充满复杂性的本事资料都未获得进入故事的资格,“江湖”被彻底清除。相反,剧烈的敌我(阶级)冲突模式成为《红岩》狱中斗争有关本事资料的基本筛选、改造和虚构的方法。显然,这么处理与狱外斗争本事改写是一致的,亦是为了在原则上保证阶级的“主导”性,尤其是要通过创造一个极端惨烈的环境,为英雄的“力学的崇高”搭建必要的叙事舞台。不过,与狱外斗争一样,“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在此同样发挥着“支撑”作用。尽管气氛低沉、肃穆,“道魔斗法”的隐形结构仍然存在,甚至比狱外斗争更见作家对本事资料的精心改写。这就涉及到第二方面,即革命之于江湖的妥协与利用,即怎样将英雄的“力学的崇高”“嫁接”到“道魔斗法”的江湖故事结构上去。比狱外斗争本事改写更见细致的,是狱中斗争的江湖化改写明显可以区分为“武斗”(斗勇)、“文斗”(斗智)两个层面。

其一,符合“斗勇”需要的叙事改写。这主要表现在徐鹏飞的“四十八套美国刑法”和许云峰、成岗等钢铁般的意志、特务“猩猩”的凶狠和渣滓洞难友的集体绝食等对抗之上。关于酷刑的描写,《红岩》无疑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诸作中最令人惊骇者。江姐遭受的“钉竹签”刑自不必说,就是成岗受刑以后的描写也令人不寒而栗:“刑讯室里寂静无声,寒光四射,冷气袭人。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也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惨白的灯光下,徐鹏飞用烟头指了指地上的肉体:‘这个人,你也许认识?’”(《红岩》,第160页)那么,这些酷刑是否有本事依据呢?对此,研究者何蜀颇有疑义。经细致考订,她认为江竹筠在狱中并未被“钉竹签”,而是“夹手指”(即古代“拶”刑),由此何蜀批评说:“历史,毕竟不应虚构——不管是以什么名义。”^[20]在此,何蜀毋宁是把小说当成档案了。其实,即便江竹筠未被钉手指,她所受其他刑罚的残酷程

度就低很多吗?据当事人回忆:“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21]其中“老虎凳”刑即恐怖异常。该刑将犯人绑坐在长板凳上,上身、双手皆被绑在背后连着长板凳的木架上,双腿被按直在凳面上,大腿则被绑在凳上,之后于小腿与板凳缝中或脚跟下置放砖块,使人双脚上抬,如此则受刑人腿部关节韧带被牵拉,轻则痛苦万分,重则残废甚至死亡。江竹筠在受刑中“曾经昏死过三次”^[22],不知是否因老虎凳所致,但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原名方琼、作家邵子南未婚妻)的确活生生地被老虎凳撬断左腿。应该说,《红岩》的虚构是有可信依据的。它的本事改写的可疑之处实在另外两点。一是把极端情境日常化了。其实特务刑讯政治犯主要在抓捕之初,关进监狱后倒很少动大刑(难友能与看守士兵比赛打篮球可见一斑),监狱的日常痛苦主要在于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对革命人士动辄戴脚镣手铐。随便搜身和检查寝室。渣滓洞牢房人多,设备简陋,每天只放风十几分钟,其余时间都被禁锢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每天吃的是发霉的米饭和一点盐汤的菜;因营养不良,患病的人很多,医药设备也很差。许多人因遭受长期折磨,20多岁头发就变白了,很多人得了严重的慢性病。”^[23]但作者把酷刑日常化了,并由之扩展成“可怕的魔鬼的宫殿”(《红岩》,第369页)的空间意象,很给读者恐惧记忆。二是小说完全“遗忘”了两处监狱的某些文明因素。其实,徐远举、周养浩(小说中沈养斋原型)等保密局负责人多受过大中专教育,他们用刑虽酷,但并未完全丧失道德底线。据沈醉回忆,江竹筠受刑时曾发生这样一幕:

徐远举恼怒地把那支烟往烟灰盘里一按,用力地在沙发扶手上一拍,眼睛正好看到了烟灰盘下的那个裸体铸像,脱口而出道:“你还装哑巴?我马上叫人扒光你的衣服,你信不信?”他的话音刚落,站在身边的几个特务立即蹿到江竹筠身边,他们最希望扒女犯人的衣服来取乐。江竹筠毫不畏惧地怒斥道:“我完全相信你会那样干,你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连你母亲、姐妹、女儿的衣服,你也能扒光!我是死也不怕的人,还怕你们扒衣服?!”徐远举被江竹筠斥责得尴尬不堪^[24]。

一个心狠手辣的特务会感到“尴尬不堪”,足见这些党国“忠义之士”并未全然忘却必要的儒家伦理。对比西北“马家军”对被俘女红军、日寇对被俘女八路的做法,白公馆、渣滓洞还不是最恶劣的。譬如,地下党员黎洁霜在狱中与恋人王振华成婚,并被允许单室居住,期间先后生育二子。此外,难友还获准与家人通信,家人亦可寄营养品到狱中。显然,这些皆是“不可叙述之事”。倘若小说都如实照述,英雄“力学的崇高”多少会受到影响。

其二,符合“斗智”需要的叙事改写。如果说《三国》、《水浒》等“旧小说”的“斗智”主要在于计谋比拼,那么《林海雪原》、《红岩》、《沙家浜》、《红灯记》就集中在语言的机锋相错。许云峰、江姐、刘思扬和徐鹏飞之间有多次唇枪舌剑,其中部分是实写。如江姐的回答:“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红岩》,第270页)有些则为虚构,如徐鹏飞、许云峰的最后对话。小说中,徐鹏飞在国军溃逃的前夕,来到地牢中向许云峰通告了这件想必让“许先生”“一定很高兴”的“好消息”,然而徐鹏飞又说:“还有一点小消息,我也不想隐瞒……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我不知道此时此地,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面对死亡,许云峰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相对,并反问道:“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红岩》,第560页)类似内敛而锋利的对话,小说出现多次。这类“被安排在两个政治集团、两种人生道路的格局中”的对话,的确“属于50年代后被重新安排的中国的历史叙事”^[25],也是“强化小说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性质的手段”^[26],但其精彩迭宕之处很难不让人想起《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中的“舌战”场景。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狱中斗争本事的改写,革命一方面毫不犹豫地剔除了纷乱的“江湖”本事,确保“阶级”在狱中斗争中的主导性和唯一性,另一方面却又巧妙地循依了“道魔斗法”的民间故事逻辑。在此,消遣性阅读反倒成为“最有效的获知方式”^[27],革命则由于“嫁接”在“江湖”之上而获得高效传播。

三、结语

可以说,《红岩》在将狱外斗争、狱中斗争的本事资料转换为故事时都比较奇妙地使用了“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这种叙事的调

适技术在确认英雄的“力学的崇高”的同时,也“满足了受众对‘刺激性’、‘风险性’和‘出乎意料的感受’的需求。”^[28]不过也恰如格雷姆·伯顿所言,大众文化这种有关“刺激”、“风险”的消费需求有是以“一个相对‘安全’的框架”为前提的。然而,《红岩》在此方面有先天不足,毕竟,重庆地下党斗争是完全失败的(狱外斗争全军覆没,狱中斗争200余人被杀,仅19人被漏杀)。为此,小说还大胆调动江湖经验讲述了两个传奇情节。一是华蓑山“双枪老太婆”神勇善谋,先是劫人后是劫狱,为渣滓洞的越狱壮举带来了胜利的呼应,二是华子良神奇装疯15年,一朝脱逃传递情报,造成内外呼应。然而考之史实,两个情节90%以上皆为虚构。“双枪老太婆”或有其人而无其事^[10]。华子良确有其人,但在《挺进报》案发生前就已脱逃(1947年),与1948年4月才陆续被捕的许建业、江竹筠等并不相识(且他脱逃后急速出川并无寻找组织营救狱中同志之举)。这两个情节无中生有,明显是对江湖趣味的有意识袭用。“双枪老太婆”、“疯老头”的确是老百姓喜欢的江湖人物(“双枪老太婆”之绰号本在农民中流传),但其原型人物并不太传奇(甚至还是知识分子),然而为使读者对“斗智斗勇”的欣赏在“安全感”中进行,小说并不计较以江湖奇侠式的劫狱来为斗争划上句号,而革命也乐于接受奇侠式的“江湖”之于“洞窟”景象的调节。如此轻重并置,进一步完善了《红岩》之于“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的巧妙使用。其中,来自华蓑山的江湖奇袭,狱中斗争叙述中革命之于江湖的驱逐与暗用,狱外斗争叙述中革命与江湖的相斥相成,共同见证了“文化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许多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阶级和利益所构成”^[29]的事实,即使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唯一的方向”的“一体化”的新中国文学中也未见发生例外。

参考文献:

- [1] 钱振文. 一个旁观者对《红岩》第一稿写作的回忆——胡元访谈录[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
- [2] 大卫·克罗图, 威廉·霍伊尼斯. 媒介·社会: 产业、形象与受众[M]. 邱凌,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0.
- [3] 王学泰.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173-174.
- [4] 范绍增. 回忆我在四川袍哥组织中的生活[M]//闻湜. 帮会势力珍闻.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5.
- [5] 马识途. 风雨人生: 下[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5: 557.
- [6] 厉华, 等. 魔窟: 来自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报告[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
- [7] 韩颖琦. 忠奸对立模式下的红色经典叛徒书写策略[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 [8] 舒星. 《红岩》中甫志高原型再益智[J]. 纵横, 1997(10).
- [9] 何云贵. 对《红岩》的接受美学分析[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 [10] 对罗广斌同志被捕问题的调查报告[D]. 重庆: 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 编号 M-99.
- [11] 石化. 说不尽的罗广斌[J]. 红岩春秋, 2000(1).
- [12] 凯尔纳. 媒体文化[M]. 丁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91.

-
- [13] 陈思和. 民间的沉浮——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J]. 上海文学, 1994(1).
- [14]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83.
- [15] 冯仲云. 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N]. 北京日报, 1961-05-09.
- [16] 海登·怀特.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 陈永国, 张万娟,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63.
- [17] 詹姆斯·C·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M]. 郑广怀,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424.
- [18] 曹德权. 红岩大揭密[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 [19] 罗学蓬. 红岩密档: B类(敌特、叛徒类)档案解密[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40.
- [20] 何蜀. 江姐受过的是什么酷刑[J]. 文史精华, 2004(5).
- [21] 罗广斌, 刘德彬, 杨益言. “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 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J]. 大众文艺, 1950(3).
- [22] 罗广斌, 刘德彬. 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G]. “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大会特刊, 1950.
- [23] 徐远举. “徐鹏飞”自述[J]. 文史精华, 2001(3).
- [24] 沈醉. 我的特务生涯[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270.
- [25] 程光炜. 重建中国的叙事[J]. 南方文坛, 2002(3).
- [26]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14.
- [27]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54.
- [28] 格雷姆·伯顿. 媒体与社会: 批判的视角[M]. 史安斌, 等,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69.
- [29] 格雷姆·特纳. 电影作为社会实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80.